

人文精神的 桃花源

钱文忠集

QIANWENZHONG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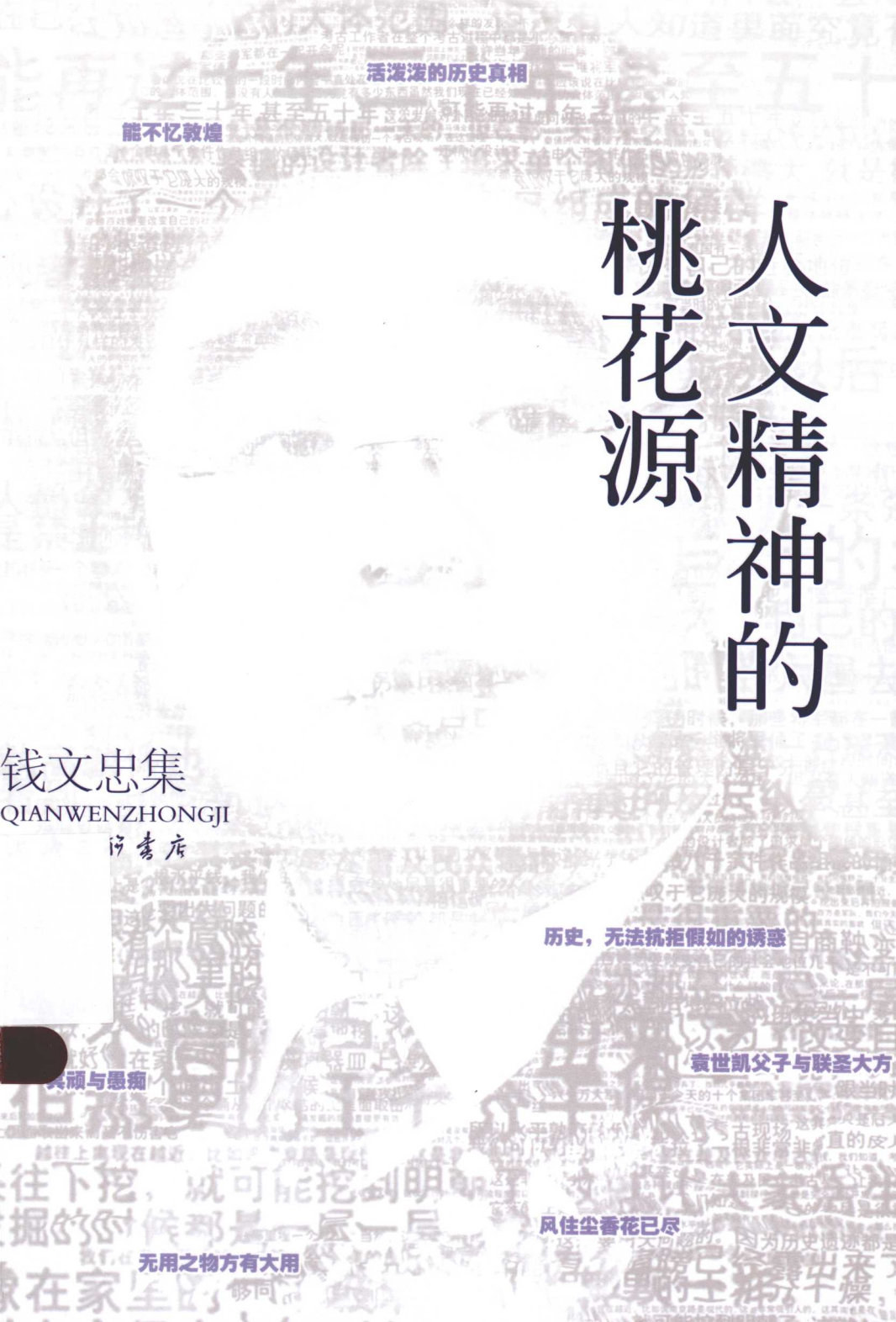
河书馆

历史，无法抗拒假如的诱惑

袁世凯父子与联圣大方

风住坐香花已尽

无用之物方有大用



013034914

I267.1
1277

人文精神的
桃花源

钱文忠集

QIANWENZHONGJI



上海三联书店



北航

C1642043

I267.1
1277

10303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精神的桃花源 / 钱文忠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5

ISBN 978-7-5426-4140-3

I. ①人… II. ①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7296 号

人文精神的桃花源

著 者 / 钱文忠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刘 佳

装帧设计 / ...设计工作室 13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7.25

ISBN 978-7-5426-4140-3 / I·687

定 价: 28.80 元

目 录

王元化先生与莎剧 / 1

“必须有心的光明”——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 3

左倾时代的革命青年 / 3

身辱志不降，吹尽狂沙始到金 / 11

千淘万漉，堂堂溪水山前村 / 21

作为长者与学者的季羨林先生 / 31

一代宗师季羨林先生的中学时代 / 44

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季羨林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 47

从齐鲁大地到清华大学 / 47

留德十年 / 48

无奈的看碗吃饭 / 52

疯狂岁月里的壮举 / 55

老骥岂伏枥 志犹超千里 / 57

为东方文化招魂 / 62

书信里的陈寅恪 / 65

《启功杂忆》乎？《杂忆启功》乎？ / 68

- 活泼泼的历史实相 / 71
- “大学者，有大学校长之谓也” / 75
- 也说王茂荫 / 79
- 写不写信及其他——与李天纲博士商榷 / 84
- 赵元任的笑与哭 / 90
- 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 / 96
- 红与黑——从周一良先生《毕竟是书生》看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历程 / 106
- “毕竟是书生”——纪念周一良先生 / 114
- 忆丹枫先生 / 124
- 娑罗耆宿朱西 / 127
- 一位没有著作的学者与作家——纪念李铮先生 / 130
- 呕心血史随人去：送钱钢兄远行 / 135
- 延华学于一脉——《华学》（一）读后 / 141
- 真实的北大 / 145
- 神秘的千年古城楼兰 / 149
- 能不忆敦煌 / 151
- 还是要学好文言文 / 154
- 历史，无法抗拒假如的诱惑 / 158
- 比大小和看热闹——也说《冰海沉船》与《泰坦尼克号》 / 160
- 对子的起源 / 163

- 对子与语文程度 / 165
- 联圣大方 / 167
- 袁世凯父子与联圣大方 / 170
- 张伯驹与对联 / 172
- 苏东坡的巧对 / 175
- 也说纪晓岚 / 177
- 章太炎的对子 / 179
- 尽显风云际会 / 182
- 气度胸襟毕现 / 185
- 进退皆成对联 / 188
- 民愤隐于对联 / 190
- 褒贬不只在对联 / 192
- 异音同字联 / 195
- 偶合集团的启示 / 198
- 雪茄情怀 / 201
- 暴民的高尔夫 / 204
- 自由岂能强迫 / 208
- 牛岛鲇子女史 / 215
- 井上大卫教授 / 219
- 回归巴别塔之前 / 222

冥顽与愚痴 / 226

风住尘香花已尽——韦莲司·胡适·杨联陞 / 231

无用之物方有大用 / 242

钱文忠：国学不是国产“心灵鸡汤” / 246

人文精神的桃花源——《弃园文粹》编后记 / 249

《道学政》译后记 / 252

《泱泱汉风》与《漠北来去》 / 255

《茶余琐话》跋 / 257

《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序 / 262

《倾听恒河天籁》前言 / 265

王元化先生与莎剧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王元化先生在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上曾经引用歌德这句话，赞叹莎翁的戏剧不仅涵盖了浩瀚的人生，而且蕴含了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与日月而同久，保存着尚未被揭示的意蕴，展示着尚有待认识的哲理。在花几个夜晚读完了元化先生与夫人张可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共同翻译（其实远远不止是“翻译”）的《莎剧解读》之后，窃以为这句话也可用以形容两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与莎翁隔世相契的精神因缘。

元化先生坦承他这一代人的文学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化观念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摆脱具有强烈意图伦理、多重功用的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青年时代的元化先生不能接受莎翁古老的语言表达方式、繁缛的隐喻与双关语、多少略带矫饰略显造作的技巧，把莎翁看做一位已然过时的伟大天才，当然也就不可能领悟莎翁洞见人类心灵的深邃观察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及整个四十年代，元化先生沉浸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之中。在光芒四射的俄罗斯文学思想家中，对黑格尔独具慧心的别林斯基用自然派来命名果戈理时期的文学现象，精辟论述并系统阐发了以人道主义为内容的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他的艺术鉴赏力在出自学识的同时，更多地源自思维活

动中特具禀赋的领悟能力，不仅深深吸引了元化先生，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为元化先生后来走近莎翁预设了精神桥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元化先生读了梁译《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撰写了《汉姆莱脱的性格》，开始认识到莎剧的耐人寻味，决非俗文俗作之可比，汉姆莱脱的犹豫迟疑促使元化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加以思考。时代与思绪一同走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元化先生和夫人长达二十年的磨难开始了。我们这一代是无法想象两位老人的痛苦经历的，但是，从惨遭迫害丧失了读写能力的张可先生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历历在目。以待罪之身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元化先生在获准读书之后，将读书范围集中在马克思、黑格尔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方面，以极其刻板的方式争分夺秒全神贯注地读书。莎翁对人及其灵魂的描写震撼了元化先生。无数人在仓皇告别或逃离理想主义的名义下背叛了理想，莎剧展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德国古典哲学蕴含的思辨力量为元化先生提供了坚守理想的无穷动力。元化先生从《奥赛罗》中感受到了“珍惜自己的名誉，固然令人钦佩；珍惜公正，则更令人敬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化先生采取了相互联系、彼此参照的方法来阅读上述三位伟人的著作。

比如，1953年版郭王合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五节提到门纳尼亚斯·阿格列巴的“无稽的寓言”，译者无注，元化先生在《科利奥兰纳斯》里找到了出典；《思辨随笔》中收入了诸如“黑格尔论莎剧的偏见”等条。其实，这又何止仅仅是读书方法的问题，元化先生说过：“等到我从黑格尔美学中理解到形象的表现方式正是艺术家感受和知觉的方式，我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原载《青年报》1998年4月24日

“必须有心的光明”

——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左倾时代的革命青年

王元化先生，号清园，祖籍湖北江陵。1920年11月30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父王芳荃先生，字维周（1880—1975），少时家贫，由教会资助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该校首届毕业生。1906年，维周先生与桂月华结婚，并于是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授英语。1911年，进清华留美学堂教授英语。两年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15年，仍回清华任教，并任注册部主任。学生中有梁思成、闻一多、陈植等。维周先生毕生在教育界工作，先后任东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武昌起义，先生曾以教授之尊自愿到战地救治伤兵，获代总统黎元洪的嘉奖。大革命期间也参加了反军阀的进步活动。

清园先生受母亲及母系亲属影响较深。先生母系亲属几乎都是当时的新知识分子。外祖父桂美鹏先生，字抟九，是沙市圣公会首任中国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工作。1885年，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即美鹏学堂（现改为新沙路小学）。

转九先生旧学湛深，同时又对西方存在着朦胧的向往，希望中国走西方富强之路。老先生虽然在先生出生前即已逝世，但是先生听母亲讲述得最多的就是外祖父，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祖母江太夫人性情慈祥，在先生幼年时，经常带先生听戏，先生对京剧的爱好即植根于此。母亲桂月华（1887—1986），年轻时曾从一位北欧传教士学医，后入上海圣玛丽女校。通英语，对文学有浓厚兴趣，记忆力极好，能背诵古代诗词及清代闺阁诗人所作弹词，经常吟唱弹词哄先生入睡。国学也有根柢，常助维周先生润色中文函牍。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均以第一名考取清华留美学堂，赴美攻读。这样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桂质庭获耶鲁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生前是武汉大学教授。桂质良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嫁闻一多堂哥一传，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医学，同时自行开业。与清园先生最亲近的三姨母桂德华也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地方，酷爱文学，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讲授外国文学。

先生未周岁即随母亲由武昌至北京和父亲团聚，全家定居清华园南院，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为邻。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落成，先生在清华园中度过了十分快乐的童年，与赵元任先生女公子如兰、熊秉明等相友善。罗家伦接管清华大学后，维周先生与罗梧，愤而辞职，转赴东北大学任教。虽然全家在此时已经搬出清华园，先生却仍然寄居在清华西院六姨母家，就读于清华附小成志小学。1929年后离开清华，回城中父母家，入孔德小学、育英小学。五年级时患病在家休养，维周先生为购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系先生首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1940年，先生撰写《金批〈水浒传〉辩正》，当道源于此。1932年，先生读初一，首次接触鲁迅作品《孔乙己》、《故乡》。

同年，全家为避日寇难逃至湖北武昌华中大学舅父桂质庭先生家，遇见韦卓民先生，从韦先生读《大学》、《中庸》。几十年后，先生更与韦先生频繁通信，讨论黑格尔学说，1981年，先生撰《记韦卓民》，记此事甚详。回北平后，先生在上学途中经常见到日寇在东交民巷练兵场附近耀武扬威，后竟荷枪实弹到领馆区域外打靶，甚至开坦克上街。先生目睹祖国蒙难，心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1935年，先生时仅十五，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于次年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读育英中学高一时，受同学推举主编校刊，在其上发表文章，谈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日货走私，因此和复兴社学生以及他们所勾结的校方展开斗争。“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家逃离北平。先生眼病未愈，由家人扶掖上车，明明知道日寇要抓知识分子，许多人因此不敢带钢笔、书籍，甚至眼镜等标明身份的物件，先生却仍然冒着很大风险，偷偷将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携带上路。

辗转到达上海后，先生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承担了联系文艺界的工作。不久，考入大夏大学经济专业。至此，先生已经违背了父母的愿望。维周先生一直逐月为清园先生存钱，作为他将来留学学习理工科的费用。先生却走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危险道路。不过，在上海期间，家里依然延请了周班侯先生教授先生英语，授以丁尼生、柯勒律治诗文；延请任铭善先生授国学，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任先生对先生影响甚大，先生写文章之注重文气就是受到任先生指点的缘故。同时，先生也开始了文艺创作，发表小说及文艺理论论文。同年，先生认识了一生荣辱与共、时在暨南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师母张可。师母出自苏州名门，祖父张一鹏先生、伯祖父张一麐先生都曾任北洋政府要职。

1938年初，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

领导下工作。当时沙文汉为省委宣传部长，孙冶方为文委书记，顾准为文委副书记。先生后来曾多次深情地说过，自己是在文委的哺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的确，孙冶方、顾准与先生精神上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同年，先生发表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这篇文章似乎尚未受到研究先生学术思想的学者的注意。文章认为新启蒙“并非五四启蒙运动的简单再现”，它的中心内容为“一、民主的爱国主义，二、反独裁的自由主义”，并且指出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提出“理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据先生五十年后撰写的《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新启蒙是一些进步理论工作者在抗战爆发前夕，国家存亡关头提出来的，“可是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用‘新启蒙’口号，这次出现不久的启蒙运动也就夭折了”。但是，这三个字在半个世纪后的1988年再次成为先生主编的，影响极大谤亦随之的杂志的名称，绝对不是一种巧合，是符合先生思想发展的脉络的。1939年，先生随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回上海后，调至文学党小组，在孤岛期间开展的文艺通讯运动中负责组织工作。同年3月，编辑出版了《抗战文艺论集》。10月，发表长文《鲁迅与尼采》，戴平万指出了此文的不足，但是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称作者对鲁迅思想的分析“非常正确”。1940年，先生发表了长文《现实主义论》和《金批〈水浒传〉辩正》。后者经修订收入《清园论学集》，是先生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文章解释了金圣叹憎恶水泊梁山，却又大捧特捧《水浒传》这一矛盾，指出金的真意乃是“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金圣叹所采取的

办法有两个：一，“把这本有生命有内容的书籍，缩小在文法的范围里”；二，“诬蔑宋江来替朝廷辩护”。文章固然带有相当浓厚的特定环境下的时代政治色彩，但是，思考角度的新颖独特、推演论证的严密细致、文笔风格的老练犀利，都是让人心折的，而当时先生还是一位未满二十足岁的青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首次明确表达了先生毕生坚持的两个重要意见，一是强烈反对“造谣中伤，曲笔构陷”，金圣叹这么做，自然引起先生“很大的反感”；二是反对“流氓习气”，因而在承认李逵“诚然可爱”的同时，批评他“乱抡板斧，不分官民排头砍去”的蛮干行为，以为“这种粗鲁角色是很容易上当和被利用的”。先生一贯反对“流氓文化”，可谓渊源有自。也就是在这一年，先生的文艺思想开始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在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后，认识到了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二元论的偏颇。这种说法来源于对普列汉诺夫艺术作品中含有“社会等价物”的观点的阐释和发挥，先生在四十年后的1980年撰文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即这种理论“可能是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二重性这种观点套用出来的”。先生之反对所谓真实性强倾向性差的说法，应该溯源于此。

1941年3月起，先生负责《奔流》文艺丛刊，并在第五辑上用笔名“佐思”发表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针对的是“和平文学”和“抗建文学”，遭到顽固派的围剿，刊物也被没收。丛刊后改名“奔流新集”，成为上海孤岛时期最后一个公开的进步文学刊物。当时先生还负责联系包天笑等礼拜六派作家。11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孤岛时期的结束，日寇占领了租界，环境更加险恶了。先生在《我所认识的纫秋》中回忆当时的情况：“上海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抗日活动转入地下，我们只在自己

的范围内活动，座谈会取消了，刊物不办了，不是工作需要的来往切断了，犯忌的书籍自行焚毁了。我们必须遵守地下工作的原则，甚至必须牺牲自己的爱好和读书的兴趣。……我们充分尝到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国之苦。”此后，先生化名王少华，在上海储能中学教授国文和文学概论，引导学生阅读鲁迅作品，并自编教材，以《扬州十日》、《指南录》等教诸生，深受诸生爱戴。1942年10月，中央指示地下党江苏省委全部撤往华中根据地，原属各委独立工作，经由交通与根据地上级组织联系，年仅二十二岁的先生一度负责文委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先生在党内学习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这个意见是和先生四十年文艺思想的转变，怀疑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二元论一脉相承的，也是先生一贯坚持独立思想的反映。1943年冬，先生创作了《舅爷爷》，意在“唤起那些陷在生活泥沼里的人们对于人性美的向往”。小说在抗战后才正式发表，得到广泛注意和好评，师陀主持的苏联电台文艺节目中播送了。先生曾经一度想放弃理论，专门从事创作。但是，先生的气质在本质上是思想家的气质，因此，这种想法自然也就被先生摒弃了。1945年，先生创作了小说《花圈》、《残废人手记》。这些小说的创作意图，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脚踪》的“序”中有所回忆：“敌人的凶残绝不仅仅止于对志士仁人所施行的杀戮和严刑拷打，而且还用无形的罪恶黑手把这个城市污染。畸形的生活在每个家庭中掀起风波，撒下不和的种子，使本来应该彼此伸出援手的亲人，在难以忍耐的生活折磨下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互相仇恨，互相伤害。敌人在毒化生活，他们摧残人性，而这些兽行却是受害者所难以觉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能忘怀这段苦难的历程。”抗战胜利后，先生和满涛（原名张逸侯，师母之兄）

在《时代日报》编辑《热风》周刊。停刊后，又与楼适夷、满涛在《联合晚报》合编文学周刊《奔流》。11月，听到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撰写了《关于罗曼·罗兰》，后以“关于‘约翰·克里斯朵夫’”为题置于《谈谈十九世纪外国几位文学家》下收入《清园论学集》。《清园论学集》所收1949年以前的文字仅四篇，这是其中之一。文章是赞美罗曼·罗兰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做先生的言志文。作为一个生活在危险之中的地下工作者，先生写道：“他行动之前并没有预先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像投机家有了成功的保障之后再动手。他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才去战斗。”先生在孤岛时期开始的，在上海沦陷后进一步加深的思考，已经使先生内心产生了冲破一切束缚的渴望，先生写道：“一个伟大的心灵就会被这种抽象的封条封闭吗？”先生后来历经劫难矢志追求的另一种现实的理想在这篇纪念罗曼·罗兰的文章里已不再仅仅是萌芽了：“罗兰像一个音乐家，不是要创造‘物质世界’领域中的现实，而是要创造‘精神世界’领域中的现实。”这篇短文在先生的思想历程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此，还应该提到，先生关于罗曼·罗兰的文字在海外也找到了真正的知音。日本著名学者相浦杲教授在1982年亲自将此篇和先生1950年所写的《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翻译成日文。相浦教授在《有关罗曼·罗兰的一些事》中写道：“时间虽已久远，其中的见解却精辟如故，使人对作者关于罗曼·罗兰研究的识见深为钦佩。……我对王元化先生——这位虽是仅长我六岁的兄长，却是杰出的古典文学家——这样的知识分子，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先生在此后的日子里，仍然主要以受党的委派编辑刊物为主。1946年4月，先生任《联合晚报》副刊《夕拾》主编，撰写了一百五十余篇《古史新论》。由于在法院审理臧大咬子案时，通译

官许少勇威胁证人，先生撰《谈丑》加以抨击，被许控告；加上时局日紧，乃离沪北上。至1948年暑假，先生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方交大）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选《文心雕龙》为教材，曾向父执辈汪公严先生问学。汪先生是广雅书院高才生，朱一新门下高弟，《无邪堂答问》有一卷即是回答汪先生提问的。汪先生曾入张之洞幕，助撰《劝学篇》。清末曾在新式学校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并曾一度在东北任溥仪的化学教师。汪先生国学功底深厚，长于艺事，精绘画，作清华校歌歌词，对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多有指点。《清园论学集》卷首所引诗“学不干时身更贵，书期供用老弥勤”即汪先生所作。先生《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某些观点最早即萌生于这一时期的授课中。在大学教书的同时，先生仍然撰写了大量文字，并被当时的文委负责人认为是《横眉小辑》的发起者，而据说其中对文艺界现象的批评违反了党的政策，刊物被勒令停办，先生遭到无理批评。1947年，先生的第一本论文集《文艺漫谈》由上海通惠印书馆出版，所收论文截至1945年，书名及笔名“何典”都由书店代拟。先生自己对本书的评论是：“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

次年3月，先生与师母按基督教仪式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婚礼，从此开始了备受学林尊敬的相濡以沫的生活。秋，国民党败局已定，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先生被召回上海，先在诚明文学院任教一学期，后被派往黄炎培任社长的《展望》杂志社任主编。《展望》不久被查封，1949年3、4月之交，先生被派负责编辑《地下文萃》。这是一项危险异常的工作，以前几期《文萃》都被国民党破获，编辑人员遭到杀害，在1949年上海这个已经失序的恐怖世界，承担这种工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随时都可能被杀害，看不到即将